

# 新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研究

■ 朱志榮 著



# 新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研究

■ 朱志榮 著



新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研究 / 朱志榮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0.04

面；公分. -- (史地傳記類；PC0101)

BOD 版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221-407-7 (平裝)

1.知識份子 2.中國

546.1135

99001441



史地傳記類 PC0101

---

## 新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研究

---

作 者 / 朱志榮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林泰宏

圖文排版 / 黃莉珊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10 年 4 月 BOD 一版

定價：370 元

---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 目次

|                         |     |
|-------------------------|-----|
| 引 言 .....               | 1   |
| 第一章 在思想解放的歲月裡 .....     | 7   |
| 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        | 7   |
| 二、反思「文革」 .....          | 20  |
| 三、新時期文藝作品的先鋒意義 .....    | 30  |
| 第二章 知識份子歷史地位的重新確立 ..... | 49  |
| 一、「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 | 49  |
| 二、知識份子獨立人格的重建 .....     | 60  |
| 三、知識份子在現代化歷程中的使命 .....  | 70  |
| 第三章 新時期的文化思潮 .....      | 81  |
| 一、《苦戀》批判 .....          | 81  |
| 二、人性、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 .....    | 92  |
| 三、「新啟蒙」 .....           | 105 |
| 第四章 知識份子對現代化道路的思考 ..... | 127 |
| 一、西體中用論 .....           | 127 |
| 二、「全盤西化」論 .....         | 138 |
| 三、民族文化本位主義 .....        | 156 |

|        |                       |     |
|--------|-----------------------|-----|
| 第五章    | 市場經濟與知識份子的處境.....     | 171 |
| 一、     | 知識份子的生存危機及其原因 .....   | 171 |
| 二、     |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與體制改革..... | 190 |
| 三、     | 中年知識份子的英年早逝 .....     | 205 |
| 四、     | 知識份子生存環境的多元調整 .....   | 213 |
| 第六章    | 知識份子新時期的心態（上） .....   | 225 |
| 一、     | 巴金 .....              | 225 |
| 二、     | 周揚與胡喬木 .....          | 238 |
| 三、     | 胡風 .....              | 253 |
| 四、     | 梁漱溟與馮友蘭 .....         | 256 |
| 第七章    | 知識份子新時期的心態（下） .....   | 273 |
| 一、     | 新三級大學生的成長及心態 .....    | 273 |
| 二、     | 留學生的處境及心態 .....       | 281 |
| 三、     | 文學作品中的知識份子形象及心態.....  | 290 |
| 結語     | .....                 | 299 |
| 後記     | .....                 | 301 |
| 主要參考文獻 | .....                 | 303 |

## 引 言

從 1976 年末到 1989 年這十來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和他的民族一起迎來了新的歷史時期。他們在經歷了一場深重的劫難、人性受到壓抑和扭曲之後，又逐步甦醒過來。從自身的解放到推動社會的變革，中國的知識份子做出了積極的努力。隨著社會變革的不斷發展，隨著中國門戶的開放，也隨著經濟形勢的不斷推進，知識份子對待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態度出現了多元化趨勢，並且產生過激烈的爭論。知識份子的經濟地位因社會的轉軌而出現過一段危機，而知識份子的社會觀人生觀也因思想意識的激進或保守，與環境發生了激烈的摩擦，因此，八〇年代後期的中國知識份子，一度陷入了苦悶和彷徨的狀態。

隨著對「文革」等時期冤假錯案的平反，加之國家建設對知識份子和人才的需要，中共中央毅然做出了給「右派」分子全部摘帽的決定。這些平反固然主要出於政治原因，而知識份子由此獲了解放，卻是不可懷疑的事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明確指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曾經把知識份子看成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不能繼續講。」他還繼續周恩來的做法，把知識份子看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在各種環境和場合下多次呼籲要在黨內造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空氣。他從教育和科技入手，推翻關於十七年的「兩個估計」，決定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和選派留學生制度，為教育和科技培養生力軍。在 1978 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還強調了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與此同時，一批知

識份子也不斷地為提高自身的地位大造輿論。這一系列的措施，以及對知識份子的科研工作環境和生活待遇的改善，重新喚起了科學家和教育家們獻身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的激情，大大地調動了廣大知識份子投身改革、建設四化的積極性。這是新中國知識份子繼1956年以後迎來的又一個春天，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永遠值得紀念的最輝煌的時刻。後來改革開放的優秀人才，大多由此獲得了培養和鍛煉。

在思想解放的運動中，知識份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無論是反對「兩個凡是」，還是在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過程中；無論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科學文化與國際接軌的艱難征途中，廣大知識份子都積極投身其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歷經「文革」的嚴冬，隨著對「兩個凡是」的批判，知識份子思想的禁區被逐漸突破，出現了一系列反思「文革」十年乃至五〇年代的傷痕文學、暴露文學等，這對於調整不正常的時代所扭曲、變異了的人性，恢復人們正常的精神生活，調動人們投身偉大、嶄新的改革時代的積極性，起著引導和鼓舞作用，而且使文學本身從「高、大、全」的桎梏中掙脫了出來，對繁榮新時代的藝術起著推動作用。雖然人們在反映社會生活的角度、尺度以及藝術形式的探索及其改革幅度等問題上曾有過種種爭議，但總體上看，對整個社會和文學藝術的發展作用是積極的。同時，隨著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和門戶的開放，一些三、四〇年代曾經被介紹到中國來的西方現代新思潮和六、七〇年代西方流行的新思潮這時被廣泛地介紹到中國來。這些新思潮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有些「文革」結束前曾經歷經苦難的知識份子和一些青年知識份子，因不滿社會中所存在的種種詬病，認同西方對立的政治形態，這就與領導層產生了激烈的衝突。領導層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主張和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

在八〇年代的社會發展進程中，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經歷了一個由興到衰的過程。從 1981 年底開始的幹部體制改革，提出幹部隊伍建設的「四化」標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使一批知識份子特別是年輕的知識份子走上了領導崗位。這在我國長期以來以官本位為尺度衡量人生價值的大眾心理中，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無形中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加之平反冤假錯案，評定職稱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宣傳，知識份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大為改觀。知識份子自身也懷著一種崇高的使命感，摩拳擦掌，為國家的四化建設躍躍欲試。但好景不長，由於領導層中不少人還存在著極左思想的殘餘，也由於一部分知識份子在思想觀念上與中央精神有一定的差異，隨著經濟的改革開放，人民的生活水準逐步提高，而知識份子的經濟和生活待遇卻逐步下滑，社會待遇在新時期也曾經明顯下降。從 1985 年開始，各類報刊已經在為知識份子的可悲境地呼號吶喊。也就在這一年，六屆人大九次會議決定，重新設立教師節。設立教師節是為了體現關懷，知識份子需要關懷，說明他們這時已經成了弱者。兒童節、婦女節、勞動節都是這樣設立起來的。當然，也有人在這一轉變的早期，採取了積極樂觀的態度來對待這一轉變。

當時知識份子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由於看待問題的視角、方法等因素，使得他們的看法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有一定的差異。這些人或是以己度人，在理解時事的政策上揉合了自己的觀點，對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搞經濟的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握得不夠準確。這就形成了一系列思想上的矛盾衝突。例如在右派平反問題上，當年的許多觀點鮮明、態度強硬的知識份子認為自己當初的觀點和價值取向是正確的，一如既往地堅持過去的意見和態度，結果導致他們與外部環境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由他們和與他們觀點相近的知識份子在思想界所形成的



思潮，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在 1986 年 12 月 30 日就說，方勵之、王若望等人「猖狂得很」，「要開除」他們的黨籍。並說「1957 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sup>1</sup>這種觀點在鄧小平的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不少知識份子看到了鄧小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點，看到了鄧小平發展市場經濟的觀點，這些觀點與他們自己的想法有一定的一致性，卻沒有意識到鄧小平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的領導這兩個方面）的態度更為堅決。少數知識份子甚至錯誤地以為資本主義只可幹、不可說，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資本主義的狗肉就是鄧小平思想。而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等少數有著幾十年中國共產黨黨齡的知識份子，則早就明確提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從改革開放早期知識份子全面地投身到國家建設之中，到八〇年代中期一部分知識份子陷入困境，迷茫、抱怨乃至和官方對抗，都反映了這部分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他們對西方民主的推崇與追求，除了與他們本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相關外，還與過去左傾錯誤給我們民族和國家所帶來的深重災難對他們所產生的影響有關。當時國際大氣候的影響，當然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一些知識份子在�新時期整個歷程中，也暴露出其自身的弱點，其中既包括傳統知識份子的弱點，也包括二十世紀後半期歷次運動中一些知識份子所形成的垢病。

在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末的�新時期，在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和黨的知識份子政策不斷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知識份子曾經復甦了他們的創造性激情，在突破思想禁區、科技革命和發展經濟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能自覺做

<sup>1</sup>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4-197 頁。

到把科技發展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把當前的事業與崇高的歷史使命結合起來。同時，在改革形勢不斷深入和曲折發展的過程中，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知識份子不斷地面臨著挑戰和抉擇，其中既反映了他們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性的一面，也反映了他們在面臨困難時的彷徨和苦悶。不過總的說來，中國知識份子在一場場社會風暴的洗禮中日益變得成熟起來。

新時期的知識份子在經歷了歷次運動，特別是「文革」的劫難以後，雖然還心有餘悸，有宛若驚弓之鳥的感覺，但總體上說，大部分人的心靈已逐步得到調整。猶如走過了漫漫的嚴冬，儘管他們還常常有乍暖還寒的感覺，但他們的思想在逐漸甦醒，思維在逐漸活躍，那一顆顆被壓抑的心也恢復了對國家前途、個人命運的信心，意識到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科學技術的總體水準已經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準，於是他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國家、為人民發奮學習，努力工作。作為人文知識份子的藝術家們、思想家們更是為國家走出危難而奔走呼號、吶喊助威。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不僅是知識份子獻身科學的真實寫照，而且還激勵了無數的知識份子包括青年學子為振興中華而「只爭朝夕」。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對過去冤假錯案的糾正和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許多知識份子特別是人文知識份子對過去和未來做了深入的思考。



# 第一章 在思想解放的歲月裡

## 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到 1976 年，中國的社會在政治、經濟、乃至科學技術等領域全面地走向了崩潰的邊緣。粉碎「四人幫」以後，舉國上下雖然都想振奮精神，發奮圖強，但整個思想觀念依然被禁錮著，極左思潮積重難返。在此背景下，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成了社會發展必須解決的前提性的根本問題。鄧小平新時期復出以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解放思想問題。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談得上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發展科學技術，才能談得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才能談得上提高人的素質。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要想解放思想，其阻力是可想而知的。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正是從支持真理標準討論開始，一步一步地推進了舉國上下的思想解放運動。而知識份子在其中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當然也不排除知識份子中一部分人長期受過極左思想的毒害，在其中起阻撓作用，但對於大部分知識份子來說，他們與改革派的領導層在思想解放運動方面總體上是合拍的，而另一部分知識份子思想則更為超前。有一些更為激進的知識份子在思想上與改革派的領導層還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不符合領導層後來所提出的、實際上也是限制他們的「四項基本原則」。在一定的範圍內可以說，是中央給了這些知識份子言論的自由。但這些激進的知識份子認為，從更高的層面上講，政府是人民的政

府，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人民，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言論。因此，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知識份子與改革派的領導層雖然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仍然有一些知識份子與中央有一定的分歧和摩擦。

毛澤東晚年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把個人崇拜推向極致，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文革」後期毛澤東本人雖有所醒悟，希望安定團結、恢復生產、發展經濟，但對於涉及「文革」帶來的後遺症的處理和「文革」評價等問題十分敏感。因此，他既同意周恩來推薦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又堅決反對鄧小平清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所謂「翻案」態度。鑒於「四人幫」與鄧小平等人的激烈鬥爭，毛澤東晚年不得不匆忙地安排他的後事，從國務院副總理中的順從、溫和派人士裡，挑選出他培養多年並從湖南提拔到中央的華國鋒出來主持工作。不久，毛澤東的心臟便停止了跳動，他反覆更迭的接班人的安排也倉促地劃上了句號。

1976年對於中國來說是多事之年，天災人禍層出不窮。1月8日，周恩來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發生了特大地震。9月9日毛澤東逝世。這些災禍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打擊，也帶來了轉機。從1月開始，特別是清明節前後的悼念活動中，社會各界表達了對「四人幫」和極左思潮的抗議。到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實施逮捕「四人幫」，中國社會發生了方向性的轉折。

不過事情還遠遠沒有這麼簡單。當時所面臨的癱瘓局面，變革起來困難重重。雖然粉碎了「四人幫」，排除了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的另一種可能性的出現，但華國鋒等人為了維持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想和政策，為了作為合法繼承人而鞏固自己的地位，出於對毛澤東的崇拜與感激，也出於幾十年來長期培養起來的思維定勢，提出了「兩個凡是」的口號。1976年11月30日，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一次公開講話中，率先提出「兩個凡是」。後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

雜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明確提出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國鋒在 1977 年 3 月 10 日的工作會議上，又強調了這一點，並根據這個原則認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這種基調，對於許多人多年來想解放思想，突破舊有束縛，促進全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無疑是一大阻力。

當然同時，華國鋒又採取了一些緩和過去矛盾的做法。這些做法為當時突破「兩個凡是」提供了重要契機。正是在這次工作會議上，華國鋒明確提出：「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儘管他當時依然在重複「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事件」的說法，但他進一步明確表態說：「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這些話在當時確實是難能可貴的。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與毛澤東去世前定下的「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並不衝突，把「少數反革命分子」與「群眾」區別開來，也符合毛澤東的辯證法。其實在當時的背景之下，邁開解放思想的每一步都是難能可貴的，當然也不能據此為不能適應新時代發展步伐的華國鋒辯護。

這時，無論是在「文革」受到衝擊的領導層，還是知識界，都感到粉碎「四人幫」就是要否定「文革」，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就涉及到毛澤東晚年的一些言論要被否定，而「兩個凡是」就成了絆腳石。於是，反對「兩個凡是」，要求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77 年 5 月，鄧小平剛一出來活動，不久，就提出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並指出毛澤東「也犯過錯誤」。<sup>1</sup>接著又碰到了一批毛澤東同意打倒的老幹部需要平反等問題。1977 年 7

<sup>1</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 頁。

月 21 日，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認為「四人幫」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隻語來騙人，嚇唬人。」<sup>2</sup>於是提出「實事求是」<sup>3</sup>這一毛澤東當年提倡的工作作風來排除極左分子干擾思想解放的行為。實事求是就是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意思，意在推翻「兩個凡是」，實行撥亂反正。鄧小平還說：「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於說裡面沒有是非問題了。」<sup>4</sup>包括 1976 年的天安門事件，包括批鄧，都是毛澤東畫了圈的，依然有是非問題。此後，鄧小平又多次重申了「實事求是」。

在 1977 年 9 月中共中央黨校復校後，全國一百四十七名省級幹部、四百九十六名司局級幹部、一百六十四名宣傳工作幹部，計八百零七名幹部參加了第一期學員班，為全國的討論真理標準、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培養了第一批幹部。在「真理標準討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就是 1978 年 4 月從第一期高幹讀書班畢業的。在 1977 年 9 月至 1978 年 4 月，黨校討論了《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的文件，文件中提出了「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的問題。這實際上正是當時鄧小平一再強調「實事求是」、反對教條主義思想的一種體現。學習毛澤東《實踐論》的活動、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

1977 年 12 月 25 日出刊的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 31 期發表了邵華澤題為《文風和認識路線》的文章，其中第三個方面專談實踐是檢驗工作的好壞、水準高低的標準，並且在一開頭就引用了毛澤東的「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的話，並且聯繫實踐做了具體的闡釋。該文公開發表在 1978 年 1 月 9 日的《人

<sup>2</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0 頁。

<sup>3</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 頁。

<sup>4</sup>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3 頁。

民日報》上。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張成（即張德成）的短文《標準只有一個》，明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當時，有些人明確寫文章反對這種提法。《人民日報》還收到了二十幾封反對的信，認為應該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後來報社請邢賁思答覆，邢寫了《哲學與宗教》一文，發表在1978年4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反對把毛澤東的言論當作神學的教條，反對搞信仰主義、愚昧主義，反對偶像崇拜。

1977年6月至8月間，南京大學哲學系胡福明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寄送《光明日報》後，又修改了多次，1978年4月經由中央黨校剛畢業出去就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楊西光的重視，並請寫了同題文章的孫長江及中央黨校部分教員參與修改，送由胡耀邦審閱，擬在《光明日報》頭版以「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目的在於「讓人覺得這篇文章來頭很大，特別引人注目」。<sup>5</sup>在人們過去的印象裡，歷來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都是中央高層授意寫的，或親自寫的。毛澤東就寫過類似的文章。《光明日報》據說以前還沒有刊登過自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文章題目中的「唯一」兩字，胡福明說是楊西光加的，吳江後來追述，說是吳江他們修改時定的。<sup>6</sup>而「科學無禁區」的說法則來自周揚<sup>7</sup>，並向胡耀邦送審了兩次，最後由胡耀邦修改定稿。先發表在中央黨校內刊《理論動態》1978年5月10日第60期，擬署名為「光明日報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做了修改」，後來又刪去了「作者胡福明」字樣，但保留「光明日報社供（胡福明）稿，本刊做了修改」的字樣。5月11日，《光明

<sup>5</sup> 胡福明：《真理標準大討論》，轉引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頁。

<sup>6</sup> 見《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

<sup>7</sup> 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第73-74頁。



日報》正式發表在頭版，那天正好是華國鋒訪問朝鮮回國。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為了避免阻力，並引起重視。它對當時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和衝破禁區，無疑起著重要作用。

關於作者問題，孫長江事後對他們幾位的作用重視不夠表示不滿。孫長江提出，該題目的文章是吳江根據胡耀邦在中央學校提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並向馬文瑞彙報，指定孫長江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來吳江在王強華把《光明日報》社胡福明的稿子送來時，將兩文「捏在一起，吸收孫文的好意見」，「文章實際上已重寫，整個過程胡福明都沒有參加」<sup>8</sup>。這個補敘過程的意圖十分明顯，淡化胡福明的作用，強調他自己和其它人的貢獻。雖然有些符合事實，但從根本上說，反映了知識份子中的致命弱點——爭功邀賞。假如這篇文章犯了彌天大罪，頂罪的人他們肯定會首推胡福明。倒是胡福明對此相對比較通脫。在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第6集中，胡福明說：「據我知道，為這篇文章做出貢獻的有一批同志，這也是集體創作。」

當然，胡福明寫作《實》文時，以及《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擬發該文時，本來只是擬發一篇理論文章而已，雖然文章本身具有現實意義，但他們並沒有有意去做政治投機，更沒有料到它會產生如此廣大而深遠的影響。現在把《實》文作為一個政治性事件進行研究，自然超出了胡、王的初衷。聯繫鄧小平、胡耀邦在此前後的有關言論和思想，鄧小平提出實事求是，胡耀邦提出真理標準問題，都是這篇文章被重點修改和編發的背景，而在修改操作過程中，更是得到了胡耀邦等人的直接支持。根據操作者的意圖（包括政治意圖）對文章做的修改（當然也包括技術上、語言邏輯上的修改），目的是通過這篇文章引起震動，推進思想解放運動，並且以

---

同上，第87頁。